

于大成及其經學之研究—— 以《理選樓論學稿》為例

蔡翔宇*

摘要

于大成先生(一九三四~二〇〇一)，《詩經》與《淮南子》研究之學者，曾任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系主任，其學識淵博，道學深厚；同時亦為著名書法家，一生熱愛書藝，樂此不疲。本文將針对于大成先生在經學上的研究，以其著作《理選樓論學稿》中關於經學方面的六篇文章，逐一進行分析，且就其研究方法與成就貢獻加以說明，並附錄相關經學著作目錄一覽表，藉此能更全面的展現于大成先生在經學研究上面的特點。

關鍵字：于大成、經學、理選樓論學稿

*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于大成及其經學之研究—— 以《理選樓論學稿》為例

蔡翔宇

一、生平簡歷

于大成先生(一九三四~二〇〇一)，字長卿，山東章邱人。據其自撰之生平描述：

曾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自幼學書畫，書以二王植其基，大字宗魯公，而以歐陽詢、李泰和、米元章、黃山谷、文衡山、王覺斯博其變化。畫學元四家，以上窺董、巨、下合四王，而於麓臺司農金剛杵法，尤有獨詣。著有《文字文學文化》、《劉安》、《淮南論文三種》、《書法》、《理選樓論學稿》、《古典文學研索》等。¹

陳師欽忠在《現代美術大系》²一書中，對十位近現代書法家有生平簡歷之敘述；其中對於大成先生之描述為：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碩士，一九七〇年獲國家文學博士。歷任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所教授、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為校讎學、淮南子學名家。書宗米芾，研精書論，俱有聲於時。一九八五年中風右痺，後改以左手書，苦練有成，舉辦個展於台中。著有《文子集解》、《淮南子校釋》、《淮南子論文三種》、《古典文學研索》、《理選樓論學稿》、《文字文學文化》、《中華藝術大觀——書法》，另有論文凡百餘篇。(先生遺著《淮南鴻烈論文集》，將於二〇〇五年底由里仁書局出版。)

¹ 此處生平描述選取自高雄市立美術館所藏之行書中堂作品所附。

² 此書尚未出版，資料之取得乃是陳師欽忠將未完成的初稿複印一份供筆者參考。

另外黃慶萱有〈于故教授大成博士事略〉³一文，對於于大成先生一生的經歷、成就與貢獻，也作了相當詳盡的敘述。綜而要之，于大成先生的生平簡歷可整理如下：

于大成先生字長卿，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日生於山東省章邱縣。先後畢業於山東省濟南市立縣學街小學、台北市師院附中、強恕中學高中部。四十四年考入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五十一年以《文子集釋》獲得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學位；後深造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五十九年以《淮南子校釋》獲得博士學位，為中華民國第十位國家文學博士。

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于大成先生出任淡江大學夜間部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六十三年八月並兼日間部中文系系主任。六十四年升任教授，並應聘於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為專任教授，六十七年八月出任中央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七十二年八月任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主持院、系行政，更籌設歷史語言研究所；同時兼課於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文化大學，所授課程計有：詩經、先秦諸子學、莊子、淮南子、中國文學史、歷代文選、應用文、國學導讀、治學方法、中國學術資料、目錄學、駢體學、書法研究等等。並於民國六十年主講華視空中教學節目之高中國文一科，前後持續八年之久。

于大成先生著作等身，自初小六年級即可見其於青島晚報副刊中之登稿，嗣後除學位論文以外，已出版之著作有：《淮南論文三種》、《古典文學研索》、《理選樓論學稿》、《文字文學文化》、《中華藝術大觀(四)——書法》、《書法教師手冊》等。另有論文散見於《中山學術文化集刊》、《孔孟學報》、《幼獅學誌》、《高雄師院學報》、《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國立政治大學學報》、《台大文史哲學報》等刊物，總計不下八百餘篇。

除授業治學以外，于大成先生亦精於書法、國畫、京劇、棋藝。書藝工二王與米芾；畫藝有黃公望、王原祁筆意，更兼拜陳定山⁴為師，書畫亦為之雙進。京劇受族叔薰陶，並親聆顧正秋等名角演出，亦受陳定山夫人十雲女士點教，能扮老生孔明、喬玄、魯肅諸角。棋藝則自幼甚精，附中就學時期已為晚報撰寫棋譜之專欄，撰有《棋壇拾零》、《開局奪先法》等書，於民國四十一年分別由青年文化書局以及南國書局出版。

³ 黃慶萱：〈于故教授大成博士事略〉，(山東文獻，第二十八卷第四期，民國92年3月)。

⁴ 陳定山，原名蘧，字小蝶，晚號定公，抗戰期間改名定山，杭州人，詩、文、書、畫俱佳，特以書畫聞名。其書由宋明而入晉唐，特擅行草，「清剛雅正之氣溢於楮墨行間」。

于大成先生幼時已罹心臟異常之疾病，民國六十八年已有不適之狀況，後於七十二年更換心臟瓣膜手術成功；但因學務冗忙，於七十四年四月一日於成功大學主持會議時突發腦中風，昏迷三週後終告復甦。雖右半身癱瘓，但先生振作奮發，勉力復健，遂漸能拄杖步行、簡單言語；更以左手學書，初則筆劃歪扭，繼而漸具字形，久乃清勁出塵，有黃山谷之筆意。更於民國八十四年在台中舉辦個人書法展，獲得蒼辣渾厚、人書俱老等評價，識者以為不讓南阜翁高鳳翰。于大成先生早年精通道家思想，閒居在家時則念佛臨池，修養身心，益發清靜澹泊；嘗書「竹石居人意，風泉靜者心」一聯，蓋自道其悟道心得。然民國八十九年底因心臟衰竭無力而入院檢查，並於九十年元月再度手術更換新心瓣膜，惜二十七日因敗血症休克而辭世往生，享年六十八歲。

二、學術研究領域

于大成先生於學廣博宏通，從其學位論文《文子集解》、《淮南子校釋》便可知其專精之領域所在。

《文子》一書，班固《漢書·藝文志》⁵著錄九篇，屬道家類著作，班固自注：

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魏晉時人如曹植、慧遠等人曾引用《文子》之言。《隋書·經籍志》⁶曰：

《文子》十二卷，其注曰「文子，老子弟子」，梁《七錄》十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著錄《文子》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文子》十二卷，《文子》徐靈府（默希子）注十二卷，《文子》李暹注十二卷。唐魏徵主纂《群書治要》及馬總《意林》中都謂《文子》有十二卷，《意林》稱引漢志所注云「(文子)周平王時人，師老君」。唐玄宗時詔封文子為「通玄真人」，其書為《通玄真經》。明代《正統道藏》⁷洞神部玉訣類有三種《通玄真經》的註疏：

⁵ 漢·班固撰《漢書·藝文志》，據叢書集成八史經籍志排印並加校補標點，(臺北市：華聯出版社，民國62年)。

⁶ 參考自《中國歷代圖書大辭典》(又名中國歷代藝文志)，(臺北市：遠東圖書公司編輯部，民國45年)。

⁷ 參考明·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61冊(第61冊為總目錄)，(台北：新文豐編審部編輯，附道藏目錄，詳註：明·白雲霽撰)。編纂者誤題，查黃海德，李剛編著《簡明道教辭典》，(臺北市：新文豐出版社，民國74年再版)應為明·張宇初，張宇清主編，明·邵以正校補。

唐道士徐靈府作《通玄真經注》十二卷；宋人朱弁也作《通玄真經注》十二卷，缺後五卷，而且《道德篇》中也沒有「平王問，文子曰」一章；宋末元初道士杜道堅撰有《通玄真經續義》十二卷。

文子本名辛鈺，屬於史官的後裔，為老子學生。其老子思想之筆記，保存大量《老子》原文無法看見的老子格言，甚至師生彼此思索問答，並繼續引伸闡發由宇宙至人生的洞見，遂有《文子》十二篇之文字流傳於世。西元一九七三年，河北省定縣西漢中山懷王墓挖出竹簡本《文子》，證實確有文子其人與其書，更為我們勾出早期道家更完整的思想圖像。⁸

《淮南子》即《淮南王書》，又稱《淮南鴻烈》，是西漢初期淮南王劉安命手下賓客集體撰作的一部奇書。劉安是漢武帝劉徹的叔父。此書雜采戰國以來除儒學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黃老道家言論。包羅萬象，從天地開闢、宇宙洪荒到黃老養生之術，無所不及。但表面上，卻似乎絲毫未涉及當時的政治與時局。因此，古今論者，都以為這是一部雜駁斑斕的純學術之書。《淮南子》本非一人撰著，立一家之言。雖大意是歸宗於《老子》道德之旨，然通視全書，則駁雜殊甚。〈道應〉篇引《老子》語而以古事為例證，頗似《韓非子》的〈解老〉、〈喻老〉二篇。〈說林〉、〈說山〉、〈人間〉諸篇多紀古事，亦類乎《韓非子》的〈說林〉和〈內外儲說〉等篇。〈時則〉篇大概同於〈呂覽·月令〉和〈禮記·月令〉。〈地形〉篇可說是《山海經》的縮本。〈天文〉、〈兵略〉諸篇也可說是漢以前說天論兵的學說的會要。⁹

以今本《文子》一書而言，內容相當駁雜，除了原始《文子》古本外，尚包含大量後世混入的其他文字；其中有四分之三均見於《淮南子》，在這些《文子》與《淮南子》的互見部份，極可能是混入與《淮南子》撰寫有關的一些資料。因此我們可以從這方面的關連性，了解于大成先生對於《文子》、《淮南子》學術研究的關係範圍。

從于大成先生發表的單篇期刊論文分析，先生著重在對於《文子》、《淮南子》篇章上的校解、補釋。¹⁰而且在著作上，亦有《劉安》（台灣商務，1987年）、《淮

⁸ 關於文子的問題，例如竹簡《文子》的成書時間、文子其人其事之考辨、《文子》一書之真偽，因屬於子學問題，此處並不加以探討。

⁹ 王雲五主編，沈德鴻選註：《淮南子》，（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22年11月第1版），頁11。

¹⁰ 于大成先生對於文子篇章的研究，有：

《〈文子精誠篇〉斟補》，《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1期，（1968年）。

《文子斟補》，《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2期，（1969年）。

南論文三種》(文史哲, 1975年)等專書。另外由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動委員會, 臺灣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於1982年12月至1987年11月出版的《中國文學講話》1-10冊, 其中在第一冊的概說部分, 第三篇的子部撰寫有「淮南子的文學價值」¹¹此一章節。

另外《中國文學講話》第二冊周代文學的詩賦部分, 于大成先生負責撰寫「二南析論」這一個章節, 收錄在第一篇詩經之部當中。而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上, 有《文字文學文化》、《古典文學研索》兩本著作。《文字文學文化》¹²一書之內容, 多半與國學常識、國文教學知識有關, 由於牽涉範圍相當廣泛, 因此訂名為《文字文學文化》。《古典文學研索》¹³一書之內容,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淮南子的文學價值〉一文以外, 尚有〈波多野太郎的中國文學研究資料索引〉、〈東坡詩詞中的自我表現〉等十二篇文章。

然于大成先生同時也是經學、訓讎學、目錄學的專家, 以在學生書局出版的《理選樓論學稿》¹⁴一書為例, 全書收錄十七篇論文, 分別為(篇名後附註原載刊物與年月日期):

〈周易虞氏學〉(原載《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三集,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出版)

〈周易釋文校唐記〉(原載《孔孟學報》二十九期, 六十四年四月; 三十二期, 六十五年九月出版)

〈尚書盤庚經傳校文〉(原載《孔孟學報》二十八期, 六十三年九月出版)

〈經書的板本¹⁵〉(原載《孔孟月刊》十二卷十一期, 六十三年七月出版)

〈王安石著述考〉(原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一卷三期, 五十七年一月出版)

〈淮南子解題〉(原載《學粹雜誌》十八卷三期, 六十五年六月出版)

《〈文子·上德〉校釋》,《高雄師院學報》第4期,(1976年)。

《〈文子·微明〉校釋》,《台大文史哲學報》第25期,(1976年)。

《〈文子·自然〉校釋》,《幼獅學誌》第14卷1期,(1977年)。

《〈文子·上禮〉校釋》,《淡江學報》第15期,(1977年)。

另外對於淮南子篇章的研究, 有:

《〈淮南鴻烈兵略〉校釋》,《台大文史哲學報》第23期,(1974年10月)。

¹¹ 〈淮南子的文學價值〉一文亦收錄於于大成先生所著之《古典文學研索》一書中

¹² 于大成:《文字文學文化》,(臺北市:文鏡出版社,民國70年新刊)。

¹³ 于大成:《古典文學研索》,(臺北市:木鐸出版社,民國73年初版)。

¹⁴ 于大成:《理選樓論學稿》,(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68年6月初版),頁1。

¹⁵ 由於于大成先生原文標題為「板」本而非「版」本,為了維持原著之原貌,故而不擅自更改用字「板」為「版」。

- 〈劉績本淮南子出於藏本考〉(原載《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三十二期,六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 〈六十年來之淮南子學〉(原載民國六十三年六月正中書局出版《六十年來之國學》第四冊)
- 〈文子集釋自序〉(原載《文史季刊》一卷三期,六十年四月出版)
- 〈諸子與經學〉(原載《孔孟月刊》十四卷十二期,六十五年八月出版;十五卷五期,六十六年元月出版)
- 〈類書薈編敘〉(原載《類書薈編第一輯·藝文類聚》卷首,六十三年八月出版)
- 〈永樂大典與大典學〉(原載大華晚報讀書人周刊,五十六年七月)
- 〈理想的古典詩集〉(原載《幼獅月刊》四十四卷三期,六十五年九月出版)
- 〈敦煌學與敦煌韻文集〉(原載大華晚報讀書人週刊,五十六年五月八日)
- 〈漢學研究方法舉隅〉(原載《幼獅學誌》十三卷一期,六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 〈二重證據〉(原載《高雄師院學報》第六期,六十七年一月)
- 〈古物與詩學〉(原載《木鐸》第七期,六十七年三月出版)

其中關於子學類有四篇,目錄辭類學之類有七篇;至於經學類則有六篇,分別為:〈周易虞氏學〉、〈周易釋文校唐記〉、〈尚書盤庚經傳校文〉、〈經書的板本〉、〈王安石著述考〉、〈諸子與經學〉。由於在於大成先生的眾多學術文章中,《理選樓論學稿》是相當具有代表意義的一部著作,與其他成果相比較,在經學研究上的著墨份量也較為豐富。因此筆者便嘗試以《理選樓論學稿》中的這六篇論文,作為對於大成先生的經學之研究範圍。

三、研究方法

于大成先生在學問知識的累積可以「既精且博」四個字來形容,而且對於資料的搜集廣泛詳盡,條例的整理周延縝密,這些研究上的特點,不可不歸功於其基本工夫的紮實深厚,以及藏書的豐富。在《理選樓論學稿》的敘言中有這樣的記載:

余於世俗之務無所好,唯好書……卷逾丁氏八千之儲,氣壓鄴侯三萬之籤……日唯繙檢載籍以為樂……若夫筆素之際,豁然洞然,則研朱而施墨,振筆而疾書,縱目眩神倦,手顫筆輒,猶且伐山采銅,鎔鑄不綴。¹⁶

¹⁶ 同註14

由此可知，于大成先生在學識上的淵深浩博，正在於日積月累、心無旁騖的勤勉鑽研，終能得其自敘中「用是二十年間，所為諸文，字數殆可以千萬計」之成就。下文將分篇分段地介紹《理選樓論學稿》中于大成先生對經學研究的方法與貢獻。

（一）、〈周易虞氏學〉

〈周易虞氏學〉一文，為于大成先生治學《周易》之所得，內容為一卷三十七事，先引《周易》經文，後加虞世南《書鈔》引申語，若遇有疑議處，則加案補充。如：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繫辭傳上）

謹案賾，深也，妙也。此聖人制易（大成案聖上當奪明字），必有所能見天下之深妙極理，故以乾坤擬剛柔，各有其體，萬物各有所宜，即是卦象也。（卷九十五）¹⁷

虞氏即初唐名書家虞世南。虞世南論著甚豐，然存於今者僅《書鈔》一百六十卷，《文集》一卷，《帝王略論》殘一卷，以及《說郛》中的〈筆髓論〉一卷而已。其中《書鈔》為《兩唐志》中記載之一百七十三卷《北堂書鈔》，為今存類書完帙之最古者。惜書流傳極艱，雖有刻本但均竄亂割裂，不可卒讀；而舊鈔本歷諸多學者校勘而未卒業，僅存元鈔原目。

（二）、〈周易釋文校唐記〉

〈周易釋文校唐記〉一文，為于大成先生欲復經典釋文之舊貌，而以敦煌出土之唐開元寫本《周易釋文》一卷，校徐乾學《通志堂經典釋文》刻本所撰之校記。內容為「大有卦」至「未濟卦」，以及「繫辭上下」、「說卦」、「雜卦」、《周易略例》等；但由於寫本為敦煌出土殘卷，因此「乾卦」至「同人卦」共一十三卦則以佚失無法校對。舉「剝卦」其中一條為例：

辨徐音辨具之辨，足上也。馬、鄭同。黃云：牀簧也。薛虞：膝下也。鄭符勉反。王肅否勉反。

大成案唐寫本出「以辨」，今本奪「以」字。「徐音辨具之辨」，二「辨」字唐寫本竝作「辨」。段玉裁曰：「辨從刀，俗做辨為辨別字，符蹇切，別作從力之辨為幹辨字，蒲莧切。古辨別、幹辨無二義，亦無二形二音也。」「馬、鄭同。黃云：牀簧也」作「馬、鄭云：牀簧也」。考集解引鄭玄曰：「足上稱辨」，則鄭與徐同；「牀簧」之訓，自是黃義。

¹⁷ 同註14，頁6。

唐寫本有奪文。唐寫本「薛虞」下有「云」字，「王肅」無「王」字，「否」作「不」，二「勉」字竝作「免」。¹⁸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四庫提要》稱為「所採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故清儒及近人之讎校經籍，撰輯佚文者，無不問津此書。然自宋末建陽書坊割裂附入經注後，刻本日少幾至失傳；現所見宋本《釋文》，有葉林宗錢氏景鈔本、徐乾學通志堂、盧文弨抱經堂二刻本等。昔四部叢刊別取葉鈔及段懋堂、臧鏞堂諸人校本撰為《校勘記》，惜釋文從成書再經宋人展轉繙刻，歷時甚久，已非原貌。

（三）、〈尚書盤庚經傳校文〉

〈尚書盤庚經傳校文〉一文為于大成先生取楊守敬寫東瀛舊本《盤庚》三篇（簡稱楊本）、敦煌秘籍留真新編景伯目二六七零本上、中二篇殘卷（簡稱留真甲本），又伯目二六四三本三篇（上篇殘缺，簡稱留真乙本），即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景中、下二篇（中篇殘缺，簡稱佚書本），以校阮氏注疏本《盤庚經傳》。內容為〈盤庚上第九〉、〈盤庚中第十〉、〈盤庚下第十一〉三個部分。如〈盤庚中第十〉之一條：

作丕刑于朕孫。

段玉裁曰：唐石經「朕孫」作「朕子孫」，多子字，足利古本亦有子。顧氏亭林謂誤。王氏鳳喈曰：「玩傳『作大刑于我子孫』，似本有子字，後人傳寫誤脫也」。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據以增經，正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比兼舉子孫也。

大成案留真乙本、佚書本但作「作丕刑于朕」，無孫字。楊本與足利本、唐本合。疑作「作丕刑于朕」者進于古，後人以傳云「作大刑於我子孫」，遂據以增孫字，或增「子孫」字耳。¹⁹

《尚書》有今、古文之分，漢初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授齊、魯間，即今文《尚書》；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壁，取得較今文《尚書》多十六篇之古文《尚書》。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取今文二十九篇，析之為三十三篇；復偽撰二十五篇共合得五十八篇，即為今所行之《尚書》本。清儒治《尚書》，亦但能就《七經孟子考文》所引，以窺古本之一二；其中阮元校注疏，用力最勤，但惜者仍在於，以不見真古本而有

¹⁸ 同註14，頁27-28。

¹⁹ 同註14，頁197。

事倍功半之憾。

(四)、〈經書的板本〉

〈經書的板本〉一文，其實是一篇演講詞，內容是于大成先生在孔孟學會第一一六次研究會²⁰所報告的紀要。

經書的板本以石經和鈔本為最古，以石經而言，清代距離現今太近，漢、魏以前卻又因年代久遠導致殘缺過甚，至於五代與宋也同樣有破損的問題，因此現存完整者為唐石經。至於鈔本多為明、清產物，其他則為出土古物²¹或敦煌殘卷，因此價值均不如刻本來得重要。書之有木刻本乃始於唐，但所刻多為佛經、曆書或私人文集，直至五代方有經書之刊刻。于大成先生認為經書的板本應該包括石經本、手鈔本、刻本三種，然這篇文章僅談刻本一項；並把刻本的經書分為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刻本三個系統分別做說明與介紹。

(五)、〈王安石著述考〉

〈王安石著述考〉為于大成先生感後人惑於「陋儒」之議，而忽略王安石著作等身之貢獻；因此在編撰王荊公年譜並考定後，得記出其共三十五種著作，故彙列為一文。其中與經學有關之著述，有十種，今存者僅《王氏洪範傳》一卷，存於《臨川集》卷六十五。先生在考證上凡出現卷數不符合者，必多方參考經籍文獻記載，以求正確無誤，所訂正者如：

《易解》二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十四卷——此從《文獻通考》)

《新經詩義》三十卷(《宋史》作二十卷——此從《通考》)

《字說》二十四卷(《通考》作二十卷——此從《宋史》)

《王氏日錄》八十卷(《郡齋讀書志》作《鍾山日錄》二十卷，《宋史》作《舒王日錄》十二卷——此從《通考》)

(六)、〈諸子與經學〉

〈諸子與經學〉顧名思義就是談諸子與經學之間的關係。《漢書藝文志》謂諸子為六經之支與流裔，故治經者不得捨諸子而言經學；昔人有言「以經證經」，于大成先生則增益一言為「以子證經」。由於魏晉以下諸子之學寢衰，因此文中所謂諸子之書，斷於漢代；而諸子之書關於經學者，先生經分析後要而論之，共列

²⁰ 本次研究會於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二日(星期日)上午九點，假台北市南海路中央圖書館舉行。

²¹ 如長沙出土的《周易》，武威出土的《儀禮》漢簡。

舉出七事為文。以下我們各列舉一例以證其研究方法：

1、證成經義

《左傳·桓公十七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案，《韓非子·難》四篇云：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已」。公子圍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

韓子此文明襲左氏而成，尤可注意者在「君子曰」一語，昔人皆謂劉歆竄入，然今韓子已有其文，則可證此為左氏所本有，而非後人妄增之。²²

2、解說經義

《淮南子·俶真》篇引《詩》云：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高誘注云：

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為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

案高氏此注，與鄭箋異義。由於高學魯詩，因此當是魯詩說也。此處正文引經，注則為說解者。²³

3、補益經文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覆羈紕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

²² 同註14，參見頁363-364。

²³ 同註14，參見頁369-370。

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擻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淮南子·說山》篇云：

文公棄荏席，後黧黑，咎犯辭歸。

《說苑·復恩》篇云：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

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案《韓非子》、《淮南子》、《說苑》之文，左氏不具，但若無此三者之補充，則左氏所稱子犯告辭之故，臣罪甚多之語，不與同心之誓，將無以明其所以然。由此例可見諸子書不獨足以補益經文，亦所以解說也。²⁴

4、校勘經文

《尚書·洪範》篇有云：「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然據《唐會要》七十七云：

開元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上讀洪範，至「無頗」，以聲不協韻，因改頗為陂。詔曰：「每讀《尚書·洪範》，至『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一。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即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遂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洪範〉『無頗』字，宜改為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

其實陂、頗皆從皮聲，今簸、破、波、跛、坡等諸字，音尚未變；而義字從我聲，正與頗音相協。故顧炎武曰：「《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況以古音求之，作頗為

²⁴ 同註14，參見頁373-374。

協」。唐石經遵玄宗之詔作陂字，今《尚書》注疏本亦改為陂，唯日本足利本尚作頗字耳。²⁵

5、輯經書佚文

以《墨子》為例，羅根澤有文〈由《墨子》引經推測儒墨兩家與經書之關係〉云：

《墨子》中引詩者十一則，以校除重複一則，實十則。在此寥寥十則中，不見今本《詩經》者至有四則之多；其餘與今本次序不同者三則；字句不同者二則；大致從同者，止一則而已。引書者三十四則，以校除重複五則，實二十九則。在此二十九則中，篇名文字俱不見今古文《尚書》者至有十四則之多；其餘篇名文字與今文《尚書》不同者一則；文字不見今文《尚書》者六則；引〈泰誓〉而不見今本者二則，與今本有出入者二則，〈泰誓〉雖在今文，但傳出於河內女子，不得與伏生所傳並論；引詩書不明而可附於書者一則，亦不見於今古文《尚書》。

從此文中可統計出，不見今本《詩經》者四則，篇名文字俱不見今古文《尚書》者十四則，文字不見今文《尚書》者六則，引〈泰誓〉而不見今本者二則；而于大成先生俱於此文中彙整條列，以證其事²⁶。

6、匡正經說

如《禮記·月令仲夏之月》：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鄭注：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刑為徑。

王念孫云：

鄭意以百官為百僚，故謂刑為刑罰。不知經文自「君子齋戒」至「以定晏陰之所成」，皆養身之事，非指朝政也。百官，猶百體也。刑當從今月令讀為徑，徑，疾也，速也。《呂氏春秋·仲夏》篇、《淮南子·時則》篇竝作徑（今本《呂氏春秋》作刑，後人以月令改之也，與高注不合），高注曰：「事無徑，當精詳而後行也」。此承上「節者欲，定心氣」為義，言非特節其者欲，定其心氣也，推而至於百體，莫不安靜，又推而至於作事，審慎精詳，毋或徑疾，以陰陽方爭，未知所定，故君子安靜無為，以定陽與陰之所成也。下文仲冬之月，自「君子齋戒」以下，文與此略同，末云：「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安形性」，即此所云「百官靜」也；「事必靜」，

²⁵ 同註14，參見頁375-376。

²⁶ 同註14，未列舉之條則亦同參見頁378至382。

即此所云「事毋徑」也；「以待陰陽之所定」，即此所云「以定晏陰之所成」也。徑、刑古聲相近，故借刑為徑，非謂刑罰也；若謂「刑罰之事，不可以聞」，則經當言毋用刑矣。但言「事毋刑」，則文不成義。

此以《呂氏春秋》與《淮南子》之文，匡鄭玄禮注之誤說，又以彼高氏之注，以說此文之義也。²⁷

7、輯古經說

《詩經·碩人》「施罟濊濊，鱸鮪發發」，高誘注《淮南子·說山》篇云：

罟，大網。詩云：「詩罟濊濊，鱸鮪發發」是也。

案，《詩·釋文》敘錄有馬融注十卷，《釋文》於「濊濊」下引馬融云：「大魚罔目大豁豁也」，是高氏「罟，大網」之訓，正用馬說。高為盧植弟子，盧則又馬氏門人也。然則高氏注《呂氏春秋·諭大》篇云：

鱸、鮪皆大魚，長丈餘。

又注《淮南子·時則》篇季春云：

鮪魚似鯉而大。

又注《淮南子·汜論》篇云：

鱸，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河西上，得過龍門變為龍。先師說云也。

從其中的師承關係之引用，我們可知此處所用俱為馬融之註解，若無諸子書之輯錄，後人則未必可知原解或正解之貌。²⁸

于大成先生最後並引《莊子·徐无鬼》語曰：

足之於地也淺，雖淺，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作為諸子學之於經學之觀點。對於經學上的疑惑不解，必得藉由多方尋求以得出真正的知識與學問，方才稱之為學習。

從以上六篇論文的介紹，我們可以了解到，于大成先生在經學研究上採用文獻，以及使用方法的特色有以下幾點：

1. 對於古籍經典的考證，採取逐字逐條、鉅細靡遺的探究方法。
2. 善用前人文獻，或是出土文物，對照經書內容，以校訂文字、文句是否有誤。
3. 對於經學的研究，特別強調板本的重要性，並認為刻本的價值高於石經或鈔本。

²⁷ 同註 14，參見頁 384-385。

²⁸ 同註 14，參見頁 387-388。

4. 從子學的研究入手，而在經學「以經論經」的研究方法上，再提出「以子證經」的研究方法。

四、成就貢獻

于大成先生在《理選樓論學稿》一書中，關於經學研究的文章，多半採整理校對或者歸納所得之形式開展敘述。這種遍覽古籍、博采眾典的考證方法，還在於先生本身亦為校讎學與類書學之名家；所以能有條不紊的掌握線索進行考據，清楚明確的運用資料加以辨證，終能有所收穫與發見。以下再從各篇文章之內容敘述其成就與貢獻：

（一）、〈周易虞氏學〉

虞世南所著《書鈔》，乃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引書正文下每有引申語以規其學詣。于大成先生治易學時，就書鈔中輯出《周易》引申語，凡得三十七事而合為一卷，故名之曰〈周易虞氏學〉。如：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象傳)

謹案畜論積聚(大成案論疑當作論)，故賢聖君子則之，須多識前聖法言，往古德行，以畜成其德也。(卷九十七)²⁹

先生在治經同時，尚能旁徵博引、廣增詳擴先賢之心血，其蒐檢整理古籍之力，以啟前人之未見重者，其功實未可沒。然筆者發現〈周易虞氏學〉一文中僅記有三十六事，不足先生所自述之三十七事，此間異同者，或為印刷缺漏、先生遺記之可能，尚待進一步查詢訂正。

（二）、〈周易釋文校唐記〉

陸德明《經典釋文》由於傳世之鈔本、刻本均非真古本，所以前人雖各具版本訂正校勘，所得終未多善。先生認為現今所見之書，經籍多誤、佚文多誣，所以苟不可讀。因此有意盡取唐宋以前諸書考之訓詁，度之音切以重校舊文，但因事繁時促，故先就敦煌出土之唐開元寫本《周易釋文》，以校通志堂刻本並撰為校記。如訓校「觀卦」其中條例之一：

居觀之時，為觀之主，觀之盛也。從盡夫觀以下，並官喚反；餘不出者並音官。

²⁹ 同註14，參見頁2-3。

大成案唐寫本但出「居觀主觀」四字，釋文「盡夫觀」下有「盛」字，「並」作「悉」。元朗之意，謂自「盡夫觀盛」已下，至「觀之盛也」，凡「觀」字十有五，並音官喚反；其中唯「至大觀在上」王肅音官，「以觀天下」徐邈音官，「大觀廣鑒」亦音官，為有異讀爾。唐寫本寫者有刪節，「盡夫觀盛」刪「盡」、「盛」二字，則與元朗『從「盡夫觀盛」』（今本奪「盛」字）之語不相應。且最末「為觀之主」與「觀之盛也」，乃是兩句，寫者不能斷句，竟刪存「主觀」二字，甚謬。唯「觀之盛也」一句，今本經、傳與王注並不見，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下，王注云：「居於尊位，為觀之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觀之極者也」一句，元朗本作「觀之盛也」，故出正文如此。³⁰

從〈周易虞氏學〉與〈周易釋文校唐記〉二文中，不難發現于大成先生對於《周易》的研究並不亞於《詩經》學或子學方面之成就。觀其讎校編輯之縝密，訓音詁字之精詳，且能從經文的對照互見中，糾舉前人因學識不足，或是輕率潦草而更改刪動之處，實為後進效法為學之標竿楷模。同時思先生之愈重校經典古籍，以發先賢潛德幽光之大志，亦可供現今專治一門一科之後學，重新省思研究學問之用力工夫。

（三）、〈尚書盤庚經傳校文〉

今所行世之《尚書》五十八篇復有〈孔氏傳〉，初以隸書古文而曰隸古定《尚書》；其傳則今字也。唐天寶間衛包改古文經為今字，唯釋文偶著其字體之異者。洎宋開寶中陳鄂、李昉據衛本刪定為今本釋文，已亡之隸古定《尚書》之面目遂更不可知。直至清末古本大出於東瀛或西陲，其中唐寫本《尚書》更多達數十卷；于大成先生取其古本與今本對校，發見奪誤不知凡幾，如：

顛越不恭(盤庚中第十)。

段玉裁曰：今本作「不恭」，衛包所改也。偽孔傳曰：「不共，不奉上命也」，考傳凡訓奉者，其字皆作共，讀為供。左氏《正義》謂《尚書》作恭，其所據《尚書》非善本也。

大成案唐人寫本隸古定《尚書》，凡共皆與今本同，恭字則作龔。上篇「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本篇「惟喜康共」，「汝共作我畜民」，下篇「爾無共怒」，字皆作共。上篇「各恭爾事」，下篇「恭承民命」，「敢恭生生」，諸恭字皆作龔。此文恭字，楊本、留真乙本、佚書本皆作龔，

³⁰ 同註14，參見頁21。

則左氏正義所據《尚書》是古本。段說誤也。又案此文越字楊本作粵。

31

而先生舉列尤為章明較著者約有以下所陳之四端：

其一，凡經文不字，古本皆作弗。

其二，經文曷字，古本皆作害。

其三，經文無字，古本皆作亡。

其四，今本傳文，於句末也字，十九削刪。³²

此蓋宋人刻書，但求其竣工之速，故於助字遂以為無關緊要而從省。

另外先生亦就上述唐人四種寫本互事勘對，得出彼此間之異同，如：

經文斤字，或从今字作其；身字或从今字作厥；又、十字或从今字作有；

呂字或从今字作以；惠字或从今字作德；惠字或从今字作喜；卑字或从今字作俾。³³

此處異同處實為古今字之差異。其實自六朝已來，今字既行，鈔寫者或無意間書為今字，如唐人衛包易古文為今字；但段玉裁、阮元皆不及於見，此先生甚為憾惜之處。由於漢石經存字過少，不足以覘漢代今文之舊，今所行之《尚書》，固與孔壁真本無殊，然清末大出之古本為隸古定寫本，則又更凌駕於其上。先生便以天寶以前諸書所引以校隸古定寫本，而就經、傳之文與今本異者提出對照後之見解；雖不對古、今字之異進行探討，然我們仍能從其校勘文句之過程記載，獲得經義、字音、字形等各方面訓正舉錯的成果。

在這三篇文章中，共有的特點就在於對古籍經典作詳盡地蒐集考辨；無論是引申語的擷取，或者群書眾籍的徵引考校。並且對先賢學者撰著之傳、注、疏，採取不輕易妥協的態度，且常有欲畢前人未竟之功的志向。因為只有抱持存疑的精神，才能夠對知識有所開發與更正。無論是《易經》或是《書經》的研究，都能夠廣採眾意群解，藉由歸納統整而去蕪存菁；這種在學識上認真負責的貢獻，確應表彰發揚於後世，以期後人之推崇與仿效。

（四）、〈經書的板本〉

經注本的系統，可從五代經書的刊刻講起，在《五代會要》³⁴一書裡面有所記載：

³¹ 同註 14，參見頁 199。

³² 同註 14，參見頁 176。

³³ 同註 31。

³⁴ 參考宋·王浦撰《五代會要》30卷，（臺北市：九思出版社，民國 67 年臺 1 版，九思叢書）

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後僱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顥、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

唐石經的刻石依據六朝以來的經注本，只刻經文而不刻注文，因注文字多；然此處不但採用唐石經的經文，還另取經注本的注文以加之³⁵，因此這項工作歷時甚久，《五代會要》又云：

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³⁶

長興是後唐明宗年號，廣順是後周太祖年號，推算共花費二十二年的時間才完成。以上是五代國子監刻經注本的大略情形。

北宋刻經始於宋太宗，然經注本至宋真宗才有刊刻。《宋史·儒林傳》³⁷記載：

田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網」，又《爾雅》「楸，木槿」，注曰「日及」，改曰「白及」。如此之類甚眾，世頗非之。

另外像是《玉海》³⁸四十三記載：

景德二年九月辛亥，命侍講學士邢昺，與兩制詳定《尚書》、《論語》、《孝經》、《爾雅》文字。先是，國子監閭：群經摹印歲深，字體訛缺，請重刻板。因命崇文檢詳杜鎬、諸王侍講孫奭詳校。至是畢，又詔昺與兩制詳定而刊正之。

祥符七年九月，又并《易》、《詩》重刻板本，仍命陳彭年、馮元校定。

自後九經及釋文有訛缺者，皆重校刻板。

由此可知刊刻並非一時即成，而是陸續刊刻，且是發現譌缺之誤便隨時重加刻板。至於南宋雖偏安江左，亦不忘刻書。《玉海》另有記載：

紹興九年九月七日，詔下州郡索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鏤板。³⁹

³⁵ 詳意可參見王靜安先生的《五代兩宋監本考》3卷，王國維撰，(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5年，人人文庫，影印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

³⁶ 同註33。

³⁷ 參考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市：錦繡出版社，民國82年再版，中國名著選譯叢書。本書原為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的《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

³⁸ 參考宋·王應麟撰《玉海》200卷，(臺北市：大化出版社，民國66年出版，影印本)

³⁹ 同註37。

所以統計五代至南宋所刻經注本，共有十二種：

《周易》九卷，〈略例〉一卷	王弼注
《尚書》十三卷	孔氏傳
《毛詩》二十卷	鄭氏箋
《周禮》十二卷	鄭氏注
《儀禮》十七卷	鄭氏注
《禮記》二十卷	鄭氏注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杜氏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	何休學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范甯集解
《孝經》一卷	御製序並注
《論語》十卷	何晏集解
《爾雅》三卷	郭璞注 ⁴⁰

另外像是張參的《五經文字》三卷、唐元度《九經字樣》一卷、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以及像是單刻本的《孟子》十四卷⁴¹，都是五代至兩宋時期刊刻的經書。經注本的行款，為半葉八行，每行大字十六字，小字二十一字，稱為「八行本」，自五代一直沿襲到明朝。

經書出現義疏乃始於六朝。漢人為經作注，經注是別行分列的，自馬融注《周禮》始合注於經。而唐代以科舉取士，因此經書需有標準本以為指歸，故孔穎達奉敕修《五經正義》做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本。而最初的正義則為單行本，不與經、注合在一起，因此北宋所刻正義便稱之為單疏本。《玉海》記載《五經正義》的刊刻，自太宗端拱元年至真宗咸平十二年，凡歷二十二年，共計：

《周易正義》十四卷
《尚書正義》二十卷
《毛詩正義》四十卷
《禮記正義》七十卷
《春秋左傳》三十六卷 ⁴²

另外《玉海》尚記載《七經義疏》的刊刻，此《七經義疏》凡一百六十五卷，計

⁴⁰ 同註14，參見頁208-209。

⁴¹ 玉海云：

祥符四年十月，校孟子。孫奭等言：孟子有張鎰、丁公著二家撰錄。今采眾家之長，為音義二卷。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義。

⁴² 同註14，參見頁211。

有：

- 《周禮疏》五十卷
- 《儀禮疏》五十卷
- 《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
-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 《孝經正義》三卷
- 《論語正義》十卷
- 《爾雅疏》十卷⁴³

上述共計十二種經書，即北宋所刊刻之總數。而《孟子》其時不列於經，故未有義疏。此十二經之單疏本，南宋時亦有重刻，《玉海》四十三云：

紹興十五年閏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請羣經義疏未有板者，令臨安府雕造。⁴⁴單疏本，是宋刻經書中的精髓，但單疏本傳世甚少，今日所可知者，據王靜安先生所云，北宋本只有「臨清徐氏有《周易正義》，日本楓山官庫有《尚書正義》」；而南宋本則有「傅增湘藏《周易正義》，日本帝國圖書寮藏《尚書正義》，日本內藤虎次郎藏《毛詩正義》(缺首七卷)，汪士鐘藏《儀禮疏》，日本身延山久遠寺藏《禮記正義》(存八卷)，上海涵芬樓藏《公羊疏》(存七卷)，《爾雅疏》兩部⁴⁵」。另外日本尚有鈔本《春秋左傳正義》，張金吾有鈔本《穀梁疏》(存七卷)，因此傳世單疏本連鈔本合計，共有九種十二本。至於單疏本的行款為半葉十五行，每行二十三至三十字不等；由於今多有景印本或覆刻本，因此在搜尋檢索上相當方便。

經文與注、疏合刻則始於南宋高宗紹興年間，黃唐本《禮記正義》⁴⁶後序云：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註、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他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

從這段記載可以知道所刻黃唐本的經注疏合刻本共有八種，分別為：

- 《周易註疏》十三卷
- 《尚書註疏》二十卷

⁴³ 同註 14，參見頁 211-212。

⁴⁴ 同註 37。

⁴⁵ 一藏於蔣穀孫氏處，一藏於日本靜嘉堂。

⁴⁶ 參考《傳世藏書·經庫十三經注疏》5冊，(中國大陸海口市：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誠成企業集團(中國)有限公司組織編纂，簡體字本)

- 《毛詩註疏》四十卷
- 《周禮註疏》五十卷
- 《禮記註疏》七十卷
-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⁴⁷

黃唐本的行款是半葉八行，行大字十四至二十字，注文雙行，行十九至二十六字，故亦可稱為「八行本」。黃唐本的卷數，大體仍沿單疏本之舊，因此並未割裂刪削，為經注疏合刻本中最善者。然流傳不廣之原因在於書店大盛，所刻之書供考試所需，因此要求及時上市的時效性，與經、注、疏合一的方便性；且求快不求好的廉價販售，造成品質之低落，終至去古本原貌越遠之壞。此種粗製濫造的經注疏合刻本，影響後世最大者即為所謂的「十行本」；屬於福州府學本，今可知者凡有十一種：

- 《周易兼義》九卷附〈釋文〉一卷，〈略例〉一卷
- 《附釋音尚書註疏》二十卷
- 《附釋音毛詩註疏》二十卷
- 《附釋音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 《附釋音禮記註疏》六十三卷
-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二十八卷
-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註疏》二十卷
- 《孝經註疏》九卷
-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⁴⁸

以後所見之經注疏合刻本，皆由這十一種的十行本系統而來。

在板本學上有所謂的補本，即前朝刻板有殘缺或字跡漫漶，必須補刻若干板者；如宋十行本之板片，自宋歷元明迭有修補，故亦稱「三朝本」或「南監本」。這種補本，跟原來南宋的十行本是有距離的。另外又有「九行本」，又稱「李元陽本」，其行款採半葉九行，為明代李元陽據十行本重刻十三經注疏之系統。但其所據已為遞經修補之本，不如原本之十行本，因此其後延續據本翻刻者，舊錯新誤

⁴⁷ 同註14，參見頁213-214。

⁴⁸ 同註14，參見頁215-216。

隨之衍生不盡。至清嘉慶年間，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雖取宋十行本為底本，優於九行本之系統，但對於單疏本僅得見《儀禮》、《穀梁》與《爾雅》三種，因此仍多未校正之錯誤。

于大成先生最後對經書的板本所下的結論是：

今日讀經，假使能以唐石經(有張宗昌覆刻本，即世界書局景印唐石十三經)及八行本、單疏本等，輔以漢、魏以下諸石經殘字、敦煌卷子、帛書《周易》、武威漢簡等，詳加校讎，相信能使經書，產生一個最完善的本子。

49

(五)、〈王安石著述考〉

王安石之著作經于大成先生考定總共有三十五種，其中與經學有關者計十種，分述如下：

- 1、《易解》二十卷——今佚。先生案：《臨川集》中，有〈易泛論〉、〈卦名解〉、〈河圖洛書義〉(卷六十三)、〈易象論解〉(卷六十五)、〈大人論〉、〈致一論〉、〈九卦論〉(卷六十六)諸篇，知公于《易》，蓋亦三折其肱矣。
- 2、王氏《洪範傳》一卷——今存《臨川集》卷六十五。距金人王若虛著述辨惑所云，此書南宋時尚有傳本，且播及於北朝。
- 3、《新經詩義》三十卷——今佚，序存《臨川集》八十四卷。《宋史》又有《舒王詩義外傳》十二卷、吳純編《三十家毛詩會解》一百卷，注云「王安石解義」；《後通志堂經解》收李迥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四十二卷，其中徵引荆公詩說至多，可以窺見荆公一家之學。
- 4、《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自元祐初國子司業黃隱燬三經新義板，其書久佚，序見《臨川集》八十四。清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曾就《永樂大典》輯出；錢儀吉為之增補百三十餘條，得十六卷，刻入經苑，陳壽祺又據魏鶴山《周禮折衷》補入數條。
- 5、《禮記要義》二卷——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著錄》，今佚。
- 6、《左氏解》一卷——今佚。
- 7、《論語解》十卷——今佚。《宋史·藝文志》論語類有〈王安石通類〉一卷，又〈王雱解〉十卷，想即此書。
- 8、《孝經解》一卷——今佚。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孝經義〉，其云「凡十七章，喪親章闕之」。

⁴⁹ 同註14，參見頁217。

9、王安石、王雱、許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今佚。

10、《羣經新說》十二卷，《論五經疑難新說》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著錄，今佚。

從以上所引可知，即便是考證所得十之有九為佚亡，仍能標舉所存篇目或序言；並從他人著作、編纂書籍中找尋線索資料，以歸結出王安石在經學上的成就，而不單單以「今佚」二字帶過，這是于大成先生研究所得的貢獻。

（六）、〈諸子與經學〉

諸子之學雖盛於六國，但漢代去古未遠，因此雖然漢武帝獨尊六經，然王充之問孔、刺孟，仍足見所受儒家思想之影響。又成於景武之間的《淮南子》，不但駁孔子、非後王，又時引詩書而說其義，並多用《左傳》之文，此亦相反相成者也。于大成先生分析諸子與經學之關係有七：

一曰：證成經義。

《左傳》一書為傳《春秋》與否，可無深論；然其書中所敘之事，每見引於《史記》，因此固先秦早有之。康有為所謂劉歆自《國語》分出，依《春秋》編年而成之事，實不可能。先生不但引《史記》以前諸子書用《左傳》語者以破康有為之惑，並舉劉正浩先生《周秦諸子述左傳考》、《兩漢諸子述左傳考》二書為參考旁證。此外又考定《公羊傳》與《穀梁傳》始著於竹帛之時間，一在漢景帝時，一亦不晚於漢景之世也。

二曰：解說經義。

諸子之書有引經而說其義者，有經義易明但述經書之事而文字不同者，亦有不為解經設而足據以解經者。乃至漢儒為諸子作傳注，其說亦有關經義，而治經者據此以解經，則可免穿鑿附會之病。漢儒注經亦注子書，有正文引經而注為說解，亦有注文自引經以證正文者，凡此皆有助了解經文。諸子雖不盡合于六經，然亦有相當關係，尤以兩漢諸子為甚；如阮元撰《詩書古訓》，楊樹達撰《周易古義》，皆多取諸子之文。且亦有諸子之文本不為解經設，所述之事亦不與經書同；然取其文以解經則可明經義，可見諸子與經學之關係。

三曰：補益經文。

諸子雖源出於經，然先秦時六國之史尚具，漢儒對舊說傳聞亦流於口耳，故其書之敘說，或有補益經文者。

四曰：校勘經文。

經書傳自孔子，歷代大儒師弟相授，雖不如諸子書錯誤之繁瑣，然因時代久遠，後人不能知古訓音，遂有臆度改動與傳寫之誤等問題。而無論是古文至隸定

的傳鈔訛誤，或是不明古音的竄動臆改，有時都能從子書上得到校正的機會。

五曰：輯經書佚文。

無論《詩》、《書》，皆為先王遺文，後經夫子刪定，後儒所誦而成今本。然早期諸子書成時或可見未刪之本，因此所引者若與今本有異，正可相互對照。此外經秦火所闕之書，亦可見其佚文於諸子書中，同樣對於補輯缺漏有所助益。

六曰：匡正經說。

古人讀經多厥身潛心於其中，並不博設其外之事，故所訓釋者便有不夠圓通者，清人則有旁求故訓於諸子者，即便不為解經，亦足以證經說之誤，於是則能凸顯子書之價值。

七曰：輯古經說。

自漢儒為六經傳注降至南北朝，一經之注常數十百家，迨乎唐、宋人為義疏，取其一以為準，遂于他家之注不復過問，因此時日俱久而漸散佚亡失。而漢之諸子書中尚能徵引遺說若干，又有為諸子作注者之徵引，尚可據以考見諸家經說之一二。然此項關係與前項解說經義不同，前者為諸子書及注中可能偶見解說經義之語，此處則指先儒舊有經注之書而今亡，但仍可自諸子書及其注文中輯存若干也者。

總上所云之關係，諸子書雖與經學關係深厚，但也並不只用於訓釋經書而已，當然今人治經，也不能只侷限於經書本身而已，尚須旁徵博引，方能得見他人所不能見者。

另外在前面有提及于大成先生對《詩經》的研究，但由於《中國文學講話》一書類似文學史之篇章，因此先生於第二冊書中所撰寫之〈二南析論〉一文，便不在此處加以分析。然我們就上述文章之摘錄援引，亦不難了解先生在《詩經》學上的成就與貢獻。

從《理選樓論學稿》當中的這六篇經學論文，可歸納出于大成先生在經學研究方面的成就貢獻有以下幾點：

1. 在經論典籍的研究方面，對於前賢學者的著作，進行旁徵博引、蒐檢整理的工作；同時抱持存疑的態度，不輕易妥協於亡佚的結果，而是儘量尋找先人的線索與資料，在廣採眾議後啟發昔人未重之見地。
2. 在經書文字的校訂方面，採取縝密、精詳的眼光，專注於讎校撰輯、訓音詁字等部分；並在多方比較各種不同經文版本的對照互見中，糾舉前人更改刪動而有誤之處。
3. 在經書版本的整理方面，對刻本、義疏本、經傳注疏合刻本等歷史淵源，

做出詳盡深入的介紹，並加以補充解釋，將石經、義疏本、出土文物等版本搭配，以全面性的對經學研究有所貢獻。

4. 將經學與子學的關係進行比較分析，得出從子學研究經學，可以有證明、解說、補益、校勘、輯佚、匡正、輯古等七個方面，在經學的研究上是有所助益的。

五、結論

綜觀上述內容的介紹，于大成先生學問之深厚、研究領域之廣博，委實令後學敬仰崇佩。特別在子學方面，先生不但是經研有成之大家；卻又能結合多門學問之精要，同時於經學研究的探索上，可見其為學功力之精淳。再加上付世資料之積聚，確實為經學做出相當多的貢獻。雖然本文研究範圍，僅設定於《理選樓論學稿》的六篇經學論文，筆者仍從中歸納出于大成先生治學的數項成就與特色：

(一)、詳盡整理古籍經典資料，經摘錄成卷而能累積集結成文。

對於古籍經典的考證、前賢學者的著作，進行旁徵博引、蒐檢整理的工作，採取逐字逐條、鉅細靡遺的方法；並抱持存疑的態度儘量尋找線索，最後則廣採眾議，綜合統一出全面性的結論。

(二)、精通考證校讎法理，藉由時代、版本之不同找尋古書字句之差異並加以刊謬補缺。

善用前人文獻，或是出土文物，以縝密、精詳的眼光，專注於讎校撰輯，以糾舉前人更改刪動之誤。

(三)、善於小學之方法，以訓詁之功對字音、字形辨正審度，以重現前人著書之原貌。

在文字、語言的漸變中，先經由文獻典籍上的記錄加以印證，並進行訓音詁字的比對；在比較對照各種版本時，藉以校訂文字、文句是否有異。

(四)、以自身經書源流歷史之嫻熟，兼之對版本、目錄學加以觀讎之專門，而能全面性的對經學提出改進與建議。

強調版本的重要性，對刻本、義疏本、經傳注疏合刻本等歷史淵源，詳實介紹解釋；並從刻本的價值高於石經或鈔本這個角度切入，將石經、義疏本、出土文物等版本搭配，以期對經學研究的全面性有所貢獻。

(五)、由不同角度的切入進行觀察，以所長之子學研究經學，並藉由比對

與勘查之證，歸納整理出經學與子學的關係。

比較分析經學與子學的關係，從「證明、解說、補益、校勘、輯佚、匡正、輯古」等七個方面，提出在「以經論經」的方法外，尚可「以子證經」，對經學的研究確實有所助益。

于大成先生乃是中文學界中，名聞遐邇的一位學者，同時也是有名的書法藝術家，其畢生多奉獻於教學與研究工作上；閒暇之餘則寄情於筆墨間，因此能在多方面的學問上獲得豐偉之成就與不朽之貢獻。其為學之精神與功力，實為後學景仰與仿倣之楷模。對於于大成先生學問之研究，其實可從經學、子學、校讎學、書學、文學等各種領域中，分別撰文進行專門探討。本文僅就《理選樓論學稿》一書中酌選六篇探討經學之文章，對於大成先生的經學進行研究；其中有所不足周延之處，尚待筆者進一步的廣蒐資料，以期有所發見。

參考文獻

- 于大成：《文字文學文化》，臺北市：文鏡出版社，民國 70 年出版，文鏡新刊
- 于大成：《古典文學研索》，臺北市：木鐸出版社，民國 73 年初版
- 于大成：《理選樓論學稿》，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68 年 6 月初版
- 宋·王浦撰：《五代會要》30 卷，臺北市：九思，民國 67 年臺 1 版，九思叢書
- 王雲五主編，沈德鴻選註：《淮南子》，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22 年 11 月第 1 版
- 王靜安先生：《五代兩宋監本考》3 卷，王國維撰，人人文庫，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5 年，影印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
- 宋·王應麟撰：《玉海》200 卷，臺北市：大化出版社，民國 66 年影印本
- 漢·班固撰：《漢書·藝文志》，臺北市：華聯出版社，民國 62 年，據叢書集成八史經籍志排印並加校補標點
- 元·脫脫等撰：《宋史》，中國名著選譯叢書，臺北市：錦繡出版社民國 82 年再版，本書原為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的《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
- 明·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61 冊，第 61 冊為總目錄，新文豐編審部編輯，臺北市：新文豐出版社，民國 74 年再版。附道藏目錄，詳註：明·白雲霽撰。編纂者誤題，查黃海德，李剛編著《簡明道教辭典》應為明·張宇初，張宇清主編，明·邵以正校補
- 《中國歷代圖書大辭典》(又名：中國歷代藝文志)，臺北市：遠東圖書公司編輯

部，民國 45 年
 《傳世藏書·經庫十三經注疏》5 冊，誠成企業集團(中國)有限公司組織編纂，簡體字本 中國大陸海口市：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 年
 黃慶萱：〈于故教授大成博士事略〉，山東文獻第二十八卷第四期，民國 92 年 3 月

附錄：于大成經學相關著作一覽表

(參考林師慶彰所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民 78)，與《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1988-1992》(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民 84)。)

篇名	刊名	出處	出版者 ⁵⁰	備註
經書的板本	孔孟月刊 理選樓論學稿 (于大成先生所著，共 592 頁) 經學研究論集(王靜芝等著，共 406 頁)	頁 29-34 頁 205-217	1974 年 7 月 臺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79 年 6 月	孔孟月刊 12 卷 11 期
		頁 289-301	臺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81 年 1 月	
王安石三經新義	孔孟月刊 經學研究論集	頁 23-27 頁 193-202	1972 年 9 月	孔孟月刊 11 卷 1 期
諸子與經學	孔孟月刊 理選樓論學稿 經學研究論集	共計 15 頁 頁 359-388 頁 55-79	1976 年 8 月、1977 年 1 月	孔孟月刊 14 卷 12 期、15 卷 5 期
詩經述要	羣經述要 (高明主編) 詩經新譯注 附	頁 39-58	臺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79 年 10 月	共 256 頁
		頁 639-658	臺北 木鐸出版	

⁵⁰ 以下出處相同者，則不再加以說明。

	錄		社 1983 年 9 月	
周易的內容	中央日報		1978 年 6 月 20 日	第 11 版
周易虞氏義	中山學術文化集 刊 理選樓論學稿	頁 93-97 頁 1-6	1969 年 3 月	第三集
周易釋文校唐記	孔孟學報 理選樓論學稿	共計 154 頁 頁 7-172	1975 年 4 月、1976 年 9 月	19 期、32 期
易經論文集			臺北西南書局 1980 年	陳新雄、于大成 合編
尚書盤庚孔傳校 文	孔孟學報 理選樓論學稿 尚書研究論集(劉 德漢等著，共計 318 頁)	頁 85-112 頁 175-204 頁 167-199	1974 年 9 月 臺北 黎明文化 事業公司 1981 年 1 月	28 期
談偽古文尚書	台灣新生報		1968 年 7 月 30 日	第 10 版
關於尚書的幾個 問題	台灣新生報		1968 年 6 月 25 日	第 10 版
尚書論文集			臺北 木鐸出版 社 1976 年 5 月 臺北 西南書局 1979 年 9 月(194 頁)	于大成、陳新雄 主編
概說詩經二南	明道文藝	頁 83-90	1983 年 8 月	89 期
二南析論	中國文學講話 (二) 周代文學 第一篇 詩經之 部 (共 532 頁)	頁 13-27	臺北 巨流圖書 公司 1983 年 10 月	中華文化復興運 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 理委員會主編
左傳論文集			臺北 木鐸出版 社 1976 年 5 月 (共 247 頁) 臺北 西南書局 1979 年 9 月(共	于大成、陳新雄 主編

			244 頁)	
孟子的注本	孔孟月刊	頁 24-25	1979 年 6 月	17 卷 10 期
說孝經	孔孟月刊 經學研究論集	頁 10-14 頁 395-406	1975 年 7 月	13 卷 11 期
談漢石經	孔孟月刊 經學研究論集	頁 16-19 頁 303-310	1970 年 7 月	8 卷 11 期
談唐石經	孔孟月刊 經學研究論集	頁 18-22 頁 311-321	1971 年 8 月	9 卷 12 期
宋高宗御書石經	中國書畫	頁 14-16	1973 年 5 月	39 期(用花菴筆名 發表)
	古今談	頁 13-14	1974 年	111 期(用述經筆 名發表)
	孔孟月刊	頁 33-36	1980 年 6 月	18 卷 10 期
博士	文字文學文化	頁 263-266	臺北 文鏡文化 事業公司 1981 年 9 月	
今古文經學	文字文學文化	頁 73-76		
顧炎武與清代考 據學	文字文學文化	頁 13-16		
王引之	文字文學文化	頁 255-258		
孟子	文字文學文化	頁 267-270		

Yu Da Chéng and His Confucian Classics Research—by "Principle Chooses Lou Lunhsueh by its work the Manuscript" for example

Shiang-Yu Tsai^{*}

Abstract

Mr. Yu Da Chéng (一九三四~二〇〇一).The Scholar of Chinese Poetry and Huai Nan Zi. Once was appointed state-run Cheng-gong University's article deanconcurrently Chinese department director. He has great learning, the Neo-Confucianism is deep, and a famous calligrapher. This article will aim at to accomplishes Mr. Yu Da Chéng 's in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esearch, "Principle Chooses Lou Lunhsueh by its work the Manuscript" center about the study of the aspect six articles,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one by one. Explanation research technique and achievement contribution. And appendix correlation study of the work catalogue data sheet. Takes advantage of this can more comprehensive unfolding to accomplish Mr. Yu Da Chéng 's above study of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

**Key word : Mr. Yu Da Chéng , Confucian Classics Research , The principle chooses
Lou Lunhsueh the manuscript**

^{*} Doctor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